

翻译的基础

苏联 索伯列夫 著

北京俄语学院出版

翻譯的基礎

索伯列夫著

翻 譯 的 基 礎

著 者 索 伯 列 夫

北 京 俄 語 學 院 出 版

北 京 俄 語 學 院 印 廠 印 刷

1958.3. 第 一 次 印 刷

定 價 0.4元

目 錄

前 言	1
第一節 翻譯的意義	2
第二節 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作家論翻譯	6
第三節 不是只翻譯詞，而是翻譯思想和形象	34
第四節 翻譯準確性的標準	40
第五節 翻譯與語言	69

前 言

本書是蘇聯索伯列夫“俄譯法教程”的第一部分。“俄譯法教程”(Пособие по переводу с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на французский)曾由蘇聯高等教育部批准為高等學校教材。從俄文來講，它是談從本國語譯成外國語的問題。但從我們來講，它却是談從俄語譯成另一語言的問題。因此，對於我們來說，它不僅在從本國語譯成外國語方面有價值，而且在從外國語譯成本國語方面也有許多很寶貴的東西值得學習。

原書有一個特點：因為原書作者索伯列夫本人不是一個脫離實踐的翻譯理論家，而是一個有很多實際經驗的老翻譯，所以他寫這本書不是從脫離實踐的抽象概念出發，而是從實際翻譯過程中具體存在的問題出發；當然也曾加以綜合，再提高到語言學和文藝學理論上加以分析，並提出了一些合理的解決方案。因此這書的實用價值比較大。

原書共分七章，本書是第一章，因為它談的是一般原理，直接牽涉到法語語法修辭的例子較少。其餘各章談到具體的翻譯方法，直接牽涉到法語語法修辭的地方很多。本書中刪去了几處較長的法文譯文，未刪去的法文譯文也未翻譯。這有兩個原因：一、不需翻譯；因原文是俄文，業已譯成中文；二、譯者不懂法文，不能翻譯。

因為感到這書有用處，所以把它獻給我們的翻譯界和翻譯教學界。水平所限，錯譯難免，如蒙指正，無任銘感。

一九五七年九月 譯者于北京西郊

翻譯的基礎

第一節 翻譯的意義

翻譯的意義在我們这个多民族、多語言的祖國的國內生活里是很偉大的。在我們与國外各民族交往的关系中，翻譯的意義也是很偉大的。大家常常忘記了，讀者在閱讀一本翻譯書籍或者一篇翻譯的文章时，他不仅是在閱讀作者的原作，同时也是在閱讀譯者的譯作。低劣的或歪曲的譯文所給予讀者关于作者的概念和关于原作思想内容和藝術價值的概念都是不正确的。好的譯文却把用另一种語言表達出來的事实、思想和形象帶給讀因者。此，在評論一部翻譯書籍的时候，批評家應當先对它的譯文作一个評價，以便讀者知道，原作的本來面目在翻譯之后還保留着多少。

譯者并不是要創造他所翻譯的那部書，正如演員并不是要創造他所演的那个戲一樣；但是譯者要創造譯文，正如演員要創造角色；同時所譯的書对讀者的影响要靠譯者努力，正如戲劇的成功要靠演員努力一樣。因此，譯者的作用和責任是非常巨大的。

高爾基曾經說過：

“要是把參加到蘇維埃聯盟的每一个民族的每一部作品都翻譯成蘇聯所有各民族的語言，那就太好了。到那時候，我們就會很快地學會了解彼此的民族文化的特征和特性，而这种了解當然會大大地加速我們建立統一的社會主義文化的過程；这种文化不僅不抹煞各族人民的个性，而且是一个統

一的、偉大莊嚴的、使全世界的面目都爲之煥然一新的社会主义文化。”^①

在写了这封信以后的时期里，在我們蘇聯培養了許多从各个民族語言譯成俄語和从俄語譯成各个民族語言的翻譯幹部。他們完成了很多的工作，由于他們的工作，使我們比十五年前更多更深地懂得“彼此的民族文化特征”。但是，把我們俄羅斯古典作品和蘇聯的政治藝術著作譯成外國語，尤其是譯成法語的情況是怎樣的呢？

法國在十九世紀是很不了解俄國作家的，俄國作家的作品也翻譯得很糟，這首先是因爲当时的法國對俄國人民和俄國生活狀況都很不熟悉。

法國譯者歪曲俄羅斯文學的情況，我們从他們翻譯的普式庚著作中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來。这个最偉大的俄國詩人的作品，在法國翻譯得很早，還是在一八一九年就开始了，但是在一九三七年 Editions Sociales Internationales（社会國際出版協會）出版的紀念集的序文里還在說：

La gloire de Pouchkine n'est contestée par personne... Et pourtant, en France, parmi les classiques étrangers il est peut-être celui que l'on ignore le plus.

（普式庚的光榮是無人可與之競爭的，但在法國，在所有外國古典作家中，他也許是最被忽略的了。）

這個現象值得奇怪嗎？法國讀者所讀到的不是普式庚的詩，而是用普式庚署名的有韻的或無韻的法文作品。您試將普式庚的詩改成俄文散文或低劣的學生習作式的俄文詩，其

① 高尔基給阿捷尔拜疆集體農莊編輯的信，刊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七日“真理报”。引文是從莫斯科一九三六年楚科夫斯基所著“翻譯的藝術”一書中引出。

結果會怎樣呢？這恰好與法國譯者翻譯的普式庚的詩一樣，不同的只是這樣：他們不是將普式庚的詩改成俄文的散文，而是改成法文的散文；不是改成低劣的學生習作式的俄文詩，而是改成法文詩。直到現在我們還未發現把普式庚的詩譯成法文的真正的譯者，也許這是因為只有掌握了俄文和俄文詩的全部優美和力量而又完全掌握了法文詩的大詩人才能成為這樣的譯者的緣故。

的確，關於普式庚的散文的翻譯，情況是要好一些，還早在十九世紀就有了一些成功的散文譯品。例如法國名作家，也是普式庚的崇拜者的梅里美所翻譯的“黑桃皇后”。但是，如果真要翻譯一個作家的作品，首先就得了解這個作家；而普式庚在法國，過去是未被了解，現在也還相當的未被了解。無論是梅里美，是默爾希涅耳·德·渥果，或者是在十九世紀撰文論述普式庚的其他的法國人，他們都不了解，普式庚是一個最偉大的、俄羅斯的、民族詩人。他們都認為普式庚是摹仿西方的作家，是十八世紀的法國的反映，而後來又是拜倫的摹仿者，也就是說，他們認為普式庚是一個脫離人民的詩人。普式庚創作中最主要的本質，深刻的人民性，在法國是未被了解的。

偉大的十月革命之後，法國人對蘇維埃俄羅斯的興趣，對這個在全世界人民中占着頭等的最先進地位的國家的興趣，十分高漲。俄羅斯古典作家和蘇聯作家作品的譯本數量都一年一年地增加。譯本的質量也在提高。但是，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的法國，却竭力企圖歪曲我國古典作家和蘇聯作家的形象。有一個情況是大家都知道的，就是法國資產階級出版社在出版蕭洛霍夫的“被開墾的處女地”的譯本時，恰好在集體化的困難尚未克服的地方就中斷了。

至於普式庚，法國資產階級批評家倒並不企圖再否認他

的創作天才的民族意義和世界意義；但是，人道主義者的普式庚，可能而且應當成為世界進步力量反對黑暗勢力、反對新的法西斯主義、反對帝國主義的同盟軍的普式庚，却被他們掉換成一個偽造的普式庚，唯美主義者的普式庚，只有“特選”的“純粹”藝術的鑑賞家才能了解的普式庚。

但是，另外還有一個法國，進步的、人民的、革命的、反帝國主義的法國。資產階級的造謠報紙企圖歪曲這個法國。因此譯者更應當加倍地記住自己巨大的責任，譯者的責任應當遠遠地超過單純文學的範圍。在翻譯書籍中，應當使原作者的全部思想藝術財富都顯露於法國讀者面前，使蘇聯的技術、科學、政治、藝術著作將我們蘇維埃國家的聲音鮮明而準確地傳達給我們的外國朋友。

第二節 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作家論翻譯

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作家的許多言論中深刻地估計了翻譯的意義。

馬克思常與他自己作品的譯者通信，也常和他感到有興趣的別人的作品（如李薩加涅關於巴黎公社的著作）的譯者通信，在通信中他不只對譯文作一般的評價，而且還對細微的語言現象提出意見。他不只是注意譯文在內容上與原文的一致，而且也注意譯文的語言和風格。他的意見一向是以仔細地對照譯文與原文為基礎的。他堅決地“拒絕”無知和草率的譯者的“效勞”，他要求譯文的語言要“輕快而靈活”，同時在術語方面又要嚴格地要求準確。

他給布拉克的信里談到了李薩加涅“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史”一書的譯文，正好可以作為說明上述情況的例子。這封信里面說：

“我把格龍赤格的譯文（第一頁）根據原文仔細地校閱了一遍，剛告訴了他，說我不能享受他的效勞。

說實在的，校改他的譯文（個別地方的修改，也許是任何譯者的譯文都不可避免的），會比我自己從頭到尾地翻譯一遍，花的時間還要更多。但我沒有時間幹這種事。對於“資本論”的法文譯本，我已經作了一次這種痛苦的試驗，我不能再作這種試驗了。

我本來很願意讓可夫斯基翻譯這本書，但他完全缺乏語言運用的輕快性與靈活性，而這恰好是翻譯這本書所必需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二十六卷，四三三頁）

……但是她（伊若爾達·庫爾茲，李薩加涅作品的譯者——索伯列夫注）在好多地方都翻譯錯了，現在舉出一些例子來。例如在十四頁上有：“幸而不確定的消息在這一分鐘之內入了門”。怎麼可能是“消息”，而且是“不確定的”，進入了門呢？法文里面是說：“une vague nouvelle”，當然，它是表示“新的波浪”（人群）！

還有，庫爾茲女士把“l'expropriation de toutes les denrées de première nécessité”（剝奪全部最必需的儲藏）——它是指政府進行的剝奪，或者是公開的占有，——翻譯成“öffentliche veräußerung”（公開的沒收），這就完全改變了原文的意思（見該書十六頁）。

Rationnement ——應譯成最低限度的口糧（例如在被圍的堡壘中或船上，儲備的食品將要消耗完畢）——她譯成了“Verpflegung aller Bürger”（對全體公民的供應）。（見該書十六頁）換一句話說，她用的是最先想到的詞，這些詞是否恰當，她是不管的。

還是在十六頁，她把“pour faire lever les provinces”當作“die Provinz auszuheben”來譯（在省里進行招募），然而這却是表示“поднять провинции”（喚醒各省）（是 провинции，不是 провинцию；即是複數而不是單數）。

在十七頁里，這位美人（指譯者伊若爾達·庫爾茲）把 mandat tacite 譯成 немой мандат（啞委任狀）；這是不可理解的，德文里可以說“молчаливое” соглашение（沉默的協議），但絕不能說“啞的”。在這一句話里，“marche de Ferrières”，是說猶里·法福爾到俾斯麥所住的地方費里耶爾去，但卻譯成了：“費里耶爾的步調”；因此，費里耶爾這個地方就變成人了！

該書十八頁譯者把戰鬥進行的地方——塞維爾——遺漏了。

同一頁里有“Trochu...lui fit une belle conférence”（托洛蘇……把他教訓了一通），譯者却譯成：“在他面前開了一個很好的代表會”。這種學生習作式的逐字翻譯在德文里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在二十頁上，譯者把 l' Hôtel de Ville 譯為“市自治局”，而作者却是指在此 l' Hôtel de Ville 開會的九月政府。

同頁 a ce lancé 被譯成純粹是學生習作式的句子：“在這次攻訐中，一切狐群狗黨都咆哮起來了”，“在這次攻訐（什麼樣的？）中咆哮起來了”等等在德文里是什麼意思呢？Lancé 在這裡應當譯成：“挑撥性的喊聲”（“Hetztzruf”）。

同頁 “d'autres tocsins éclatent”，譯者譯成：“新的（為什麼不是舊的？）鐘打着警鐘”。實際上這裡是這樣的意思：“他們在打聽新的災難”。“éclatent” 這個詞和這一句話就充分表示她完全是在胡寫。

在二十五頁上庫爾茲女士把法國革命中的“雅各賓黨人”變成早已不存在了的“天主教神父”了。（кордельер 一詞有兩個意思，一是天主教神父，一是雅各賓黨人。——譯者注）除此之外，她還把“le prolétariat de la petite bourgeoisie”——小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改成：“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這純粹是粗枝大葉！

二十六頁上的 contre-maitres，她譯成了“水兵上士”，而這裡是指工長，（Werkführer），而 chefs d'ateliers，這是指工作里的首長。（industrielle Dirigenten）。

第三十頁上有：“Paris capitulait avant le 15 sans

l'irritation des patriotes”，庫爾茲把它譯成：“巴黎在十五日以前投降，而且愛國者方面沒有任何憤激情緒”。如果說這樣譯是正確的，除非原文里有：“*Paris capitulait etc. sans l'irritation de la part des patriotes*”（但这里的原文却是：“*sans l'irritation des patriotes*”）。

因此，这里完全把意思弄反了，應該是：“要是沒有愛國者的憤激情緒，巴黎在十五日以前就投降了。”

这个很簡單的句子又造成了十分明顯的、不可饒恕的粗枝大葉的錯誤。

三十二頁上有：“Jules Favre demandait à Trochu sa démission”，庫爾茲譯成：“猶里·法福爾要求托洛蘇允許他解雇”。但一个人是不能自己把自己解雇的，只能被他的長官解雇，這句話的意思只能是說，猶里·法福爾想从托洛蘇那里得到允許解除他（法福爾）所担任的職務。实际上是猶里·法福爾要求他（托洛蘇）退職，這也是逐字翻譯“*démission*”的原故。（“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二十六卷第458—459頁，461—462頁。）”

翻譯是用另一種語言正確地傳達原作者的思想和他所創造的形象，絕不是向讀者介紹譯者自己的思想和形象。馬克思在“神聖家族”中很尖刻地嘲笑了蒲魯東作品德文本的譯者，因為這個譯者對原作者的思想不滿，採用了“說明式的”，或者說“批判式的”翻譯。

“我不願意（這是經過批判式的翻譯出來的蒲魯東在說話）提出關於新社會的任何制度，無論什麼我也不願意要，除開廢除特權，消滅奴隸制……除開正義，我什麼也不要，除開正義，——這就是我所想的”。

被說明的蒲魯東只不過是有意願與見解而已，因為“善良的意願”和非科學的“見解”正是沒有批判力的群眾的

特征。被說明的蒲魯東的特征正是適合于羣衆的那種溫和的精神，而且把他所願意的去服從于他所不願意的。他不敢提出新社會的制度，他希望少些，甚至于無論什麼也不要提，除開廢除特權等等以外。除開這樣批判性地將他自己所具有的意願去服從于他沒有的意願以外，他的開頭的話也就暴露出邏輯上的不通。作者開頭就宣稱，他不願意提出新社會的制度，當然，他應該告訴我們，他所願意提的，——無論是系統化了的舊的，或者是尚未系統化的新的。但是，被說明的蒲魯東，他不願意提出新社會的制度，——他願意提出廢除特權嗎？不，他只是願意廢除。

實際上的蒲魯東說：“Je ne fais pas de système; je demande la fin du privilège, etc.”（我不創造任何制度，我要求……）這就是說，實際的蒲魯東在宣布，他不追求任何抽象的科學上的目標，而只是要向社會提出直接的實際的要求。而他提出的要求完全不是隨便提出的。這些要求在他提出的題目的發展過程中是有理由、有根據的。這些要求就是下述發展過程的一個大概情況：justice, rien que justice, tel est le résumé de mon discours.

（正義，只有正義，這就是我的發言的概要）被說明的蒲魯東連同他的“正義，只有正義，——這就是我所想的”，一同陷入更困難的境地，他還“想”得有許多其他的東西，而且按照艾得加爾的說明，例如他“想”，哲學的實用性不足，他“想”反駁薩爾·孔特等。

經過批判的蒲魯東向自己問道：“難道人總是要不幸嗎？”換句話說，他是在問：難道人類精神上的使命就是不幸嗎？而實際的蒲魯東，一個輕浮的法國人，却問道：物質上的需要和精神上的需要就是不幸嗎（L'homme doit-il être éternellement malheureux?）？

群眾的蒲魯東說：

“Et sans m'arrêter aux explications à toute fin des entrepreneurs de réformes, accusant de la détresse générale ceux-ci la lâcheté et l'impéritie du pouvoir, ceux-là les conspirateurs et les émeutes, d'autres l'ignorance et la corruption générale”, etc.

因為“à toute fin”是下流的群眾詞語，在德語的一般羣衆性詞彙里找不到，因此，經過批判的蒲魯東當然就拋棄了這個“解釋”的更準確的定義。這個術語是從法國羣衆法學里借來的，“explications à toute fin”表示消除一切反對意見的解釋。經過批判的蒲魯東凌辱“改良主義者們”，也就是說凌辱一個法國的社會黨，而羣衆的蒲魯東凌辱“改良的工廠主們”。“羣衆的”蒲魯東將這些“entrepreneurs de réformes”（改良的工廠主）分爲几類：一些人（ceux-ci）這樣說，另一些人（ceux-là）那樣說，再一些人（d'autres）又那樣說。經過批判的蒲魯東使某些改良主義者“一會責難……一會責難……”無論如何，這也証實了他們是沒有一定的見解的。實際領導過法國的羣衆性實踐的蒲魯東說到“conspirateurs et les émeutes”，也就是說，在起初談到陰謀家們，後來就只談到他們的行動——暴動。經過批判的蒲魯東，把各種不同的改良主義者混成一團，相反的，把暴動者分成几類，而且說：“陰謀家和暴動的罪魁”，羣衆的蒲魯東談到落后和“一般的腐化”。經過批判的蒲魯東把落后改成愚蠢，把“腐化”改成“墮落”，而且在最後他又作爲批判性的批評家，把愚蠢弄成普遍性的。他自己直接舉了一個例子，把“générale”解釋成用復數代替單數。他把“l'ignorance et la corruption générale”譯成：“普遍的愚蠢和墮

落”。按照非批判性的法蘭西語法，这里应当是這樣的一句話：“l'ignorance et la corruption générales”。①

馬克思要求譯者要譯得準確，并批判了逐字翻譯。他在資本論法文本的跋里面說：

“~~此~~·魯阿先生原說要盡可能譯得準確，甚至於要譯得逐字準確。他老老實實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務。但正是他的老老實實和準確使我不得不大加刪改，以便讓讀者更容易了解”。②

馬克思把自己的文章看作一個藝術的整體。他在一八六五年七月三十一日給恩格斯的信中說：

“……Whatever shortcoming they may have（無論它們的缺點如何——索伯列夫注），但有一點是我的文章里的優點：它們是一個藝術的整體。要做到這一點，只有按照我的方法——在文章沒有完全弄好之時，不要拿去付印”。③

當然，這個規律既適用於翻譯馬克思的文章，也適用於翻譯一切作品。所要翻譯的不是單詞，不是句子，而是整個作品，在全部譯文“完全弄好”之前，就不能認為其中任何部分的工作算是完成了。

馬克思在翻譯工作方面提出了一個十分重要的一般問題：關於譯者的世界觀對譯文的影響問題。在他給恩格斯的信中提到格里木在翻譯中所犯的錯誤時說道：

“人類歷史上所發生的現象與古生物學里是一樣的。甚至於最卓越的聰明人，由於某種‘判斷上的盲目’，會看

① 馬克思恩格斯合著“神聖家族”，見馬恩全集俄文版卷三，41—43頁。

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十七卷24頁。

③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294頁。

不見近在他們鼻子下面的事物。而后來他們又會大為吃驚，到處都出現了他們過去沒有注意到的現象。反對法蘭西革命及其啓蒙運動的第一種反动思想自然是要恢復中世紀浪漫主義時代的一切，甚至于像格里木這樣的人也不能擺脫這種桎梏。第二種反动思想——它是與社會主義的潮流相適應的，雖然這些學者們並沒有猜想到它與自己的聯系——是從中世紀來看每個民族的原始時代。而就是這一類，也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在最古的時代，他們也發現了最新的事物，直到人類平等的捍衛者，因此，這使得蒲魯東本人也感到害怕”。^①

馬克思又進一步指出，格里木，他的眼睛為成見所蔽，在很多地方都誤解了塔赤特。

恩格斯引証了馬克思所說的下面這段話，馬克思認為思想上的偏見會使譯者歪曲原文，他說：

“西歐的學者，大部分是天生的宮庭奴僕，他們把希臘時代的國王（*Базилевс*）改成現代語里的專制君王（*Монарх*）。美國的共和主義者摩爾根就反對這一點。他諷刺地，但完全公正地談到油滑的格拉德司通先生和他的“*Jeventus Mundi*”（“世界的青春時代”）說：“格拉德司通給我們把英雄時代的希臘領導人描寫成為國王、大公等，而且說他們還都是正人君子；但是格拉德司通自己都必須承認，在他們之間，長子繼承權或長子繼承的習慣，似乎相當普遍，但是表達得不太明確”。

……因此，從詞源上講，把“*Базилевс*”譯成德文里的“*König*”（*Kuning*）是完全正確的，因為“*König*”產生于 *Kuni*，而 *Künne* 又表示“族長”的意思。但古希

^① 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選集，俄文1947年版200—201頁。